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学与文化丛书

文化转型中的 中国近代

戏剧

左鹏军 著

南方出版社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学与文化丛书

文化转型中的
中国近代

戏剧



ISBN 7-80660-104-X



9 787806 601044 >

ISBN 7-80660-104-X / J·2

定价: 25.00 元

文化转型中的 中国近代戏剧

左鹏军 著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转型中的中国近代戏剧/左鹏军 著. —海口: 南方出版社, 1999. 12

I. 文…

II. 左…

III. 戏剧史 — 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J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0565 号

责任编辑:侯秀菊 庄 森

封面设计:蒙复旦

文化转型中的中国近代戏剧

左鹏军 著

★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 楼 邮编 570203)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海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10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60-104-X/J·2

定价:2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近代戏剧发展的文化史背景	(1)
第一节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近代转型	(1)
第二节 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三个趋势	(12)
第二章 中国近代文化变迁与戏剧走向	(23)
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嬗变与传奇杂剧的终结	(23)
第二节 地域文化的兴盛与京剧及地方戏曲的繁荣	(30)
第三节 西方文化东渐与话剧的形成	(36)
第三章 中国近代戏剧发展的基本脉络	(40)
第一节 中国近代戏剧的发展阶段	(40)
第二节 中国近代戏剧的三足鼎立格局	(50)
第四章 近代文化变革与戏剧诸方面变迁	(69)
第一节 戏剧家社会角色的近代转变	(69)
第二节 戏剧社团、戏剧运动的作用与贡献	(73)
第三节 戏剧传播媒介的近代变革	(79)
第四节 戏剧接受者的近代变化	(85)
第五章 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近代戏剧观念	(91)
第一节 古代戏剧观念的近代转变	(91)
第二节 梁启超与戏剧观念的政治化	(95)

第三节 吴梅与传统戏剧观念的近代命运	(102)
第四节 齐如山与戏剧观念的民族化	(113)
第六章 传奇杂剧的近代命运	(124)
第一节 近代传奇杂剧的主要题材类型	(124)
第二节 近代传奇杂剧的艺术特征	(159)
第三节 近代传奇杂剧的语言特点	(190)
第四节 近代传奇杂剧的舞台艺术	(199)
第七章 京剧和地方戏曲	(215)
第一节 京剧的兴起	(215)
第二节 近代京剧改革	(222)
第三节 京剧的兴盛发展	(228)
第四节 京派和海派	(234)
第五节 川剧、秦腔与其他地方戏	(237)
第八章 从文明戏到话剧	(244)
第一节 文明戏与话剧	(244)
第二节 文明戏的兴起和衰落	(249)
第三节 话剧的发展和成熟	(260)
第九章 走向世界文学与戏剧翻译	(269)
第一节 认识 and 了解外国戏剧	(269)
第二节 外国戏剧的翻译改编	(284)
结语	(292)
参考文献	(297)
后记	(308)

第一章 中国近代戏剧发展的文化史背景

中国近代戏剧发生发展的文化历史背景与古代相比,出现了许多的不同,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化,中国人自古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剧烈的精神震撼。概括地说,这个时间并不算很长但是变革异常迅猛的文化时代,就是由两个方面的文化变革交织而成的: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嬗变的过程,即古与今的文化矛盾;一是外国文化主要是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也就是中与外的文化对抗。中国近代戏剧在前所未有的文化舞台上展开,也就上演了一出前所未有的剧目,留下了独特而鲜明的历史轨迹。

第一节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近代转型

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国文化,在其源远流长、代代相续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无数的变迁。博采众长,绵绵相传,变化发展,不断创新,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通常状况。也正是因为这样,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对变与不变之关系做出了具有辩证思想特色

第一章 中国近代戏剧发展的文化史背景

的理解。“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①，这反映了许多中国人对世道时势之隆替、万事万物之消长起伏的普遍认识。因此，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变易、更新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古往今来的中国人认识世界的重要思维方法之一。

但是，当时间运行到 19 世纪以后，当历史的脚步迈入近代门槛的时候，有着深刻变易思想基础的中国人，还是为世事的变化所震惊，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觉到无所适从，许多人心理上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焦虑感。这种深刻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世界走向了中国”，和中国人随后作出的回应“中国走向世界”，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实现由古代向近现代的文化转型和中国文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

实际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充分的接触，在明代末年就已经有过一次重要的机会，令后人觉得十分惋惜的是，那一次本来可能改变中国文化发展走向的机遇，却在一次次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中轻易地错过了。无论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本身的发展状况来看，还是从当时的世界局势以及为中国提供的机遇来看，明代末年都是一个极好的改变中国整体文化处境的时机。当时西方以利玛窦等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士除了把基督教的一些教义介绍到中国来以外，还将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技术工艺等内容介绍到中国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曾经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人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进行过认真的考虑，于是开始注意在进行文化宣传的时候，努力让自己尽可能地“中国化”，以获得中国官员、皇帝和广大百姓认同，把基督教思想与孔子学说相结合，穿着儒服进北京拜见皇帝，都是具有重要

^① 《周易·系辞下》。

文化史意味的选择。但是由于明王朝国运的式微直至消亡,清朝入主中原,统治全中国,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机会在意外的政治动荡和王朝更替之后,被轻易地错过了。

清军人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历史出现了严重的倒退。清朝统一中国、政权巩固之后,还曾有过一次历史上闻名的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这就是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八年(1792年~1793年)英国派往中国的由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的访华活动。1792年9月6日,英国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访问中国,名义是向乾隆皇帝祝寿,实际上是希望藉此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在双方就一些今天看来并不重要的问题经过了相当复杂的谈判之后,诸如会见时两国的礼仪,特别是英国使团是否答应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跪拜礼”,中国大臣又须如何向英国国王的画像行同样规格的礼以示尊敬,1793年8月5日,乾隆皇帝终于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使团。但是,当时从皇帝到大臣,对英吉利并没有丝毫有价值、有意义的了解,对英国人来华这一事件的真正意义也没有任何体会。于是,再次将一次可能出现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好时机变成了一件令当时的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笑话。

完全相反的是,来者有心,英国人却从此次远东之行中深切地了解了这个东方大国从皇帝到平民的生活状况、文明程度、知识水平,他们也似乎从这次颇有喜剧色彩的经历中,感觉到了应当如何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与傲慢而愚昧的中国王公大臣打交道。有关此次英使来华的具体情况和对中国的观感,英国人斯当东(Sir George Staunton)所著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第一章 中国近代戏剧发展的文化史背景

China)一书中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从历史的连续性和重要事件的因果关系上来看,可以认为乾隆年间的英国使团来华以及所发生的一切,实际上埋下了半个多世纪以后鸦片战争的种子。

时间到了道光二十年,就是公元 1840 年,就在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仅仅四十七年之后,英国人又一次出现在珠江口,不同的是,英国人以一种与前次完全不同的姿态进入了中国的领土,也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随后发生在我们历史中的事实是无数中国人非常熟悉而且痛心疾首的,不需要更多的描述,只要看一看这些事件就足以体会到那是怎样的充满苦难与哀伤、奋斗与抗争:

1840~1842 年鸦片战争。结果是《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这个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中的古老帝国从此走上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道路,清政府已经维持了二百年的统治开始处于日益危殆的风雨飘摇之中。也是在此时,以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学者、官员能够开眼看世界,敢于以经术作政论,慷慨论天下事,并提出“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①的主张,走上了自我觉醒与唤起同胞的自强自救之路。

1851~1864 年,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金田起义开始之后,起义军从南向北,迅速占领南京并定都于此,改称天京,随后又以席卷一切的气势直逼北京。虽然在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清朝大臣以及外国势力的联合剿杀之下,太平天国在坚持了十四年之后终于失败,但是在这次空前规模的农民战争的打击下,清王朝的元气实际上已经大伤,无法真正恢复振作了。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次起义实际上改变了清王朝的命运,也改

^① 魏源,《海国图志序》。

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路程。

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打击清王朝,并获取更多在华利益的一场战争,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新一轮践踏蹂躏。清王朝在这次战争中失败的结局不言自明,更加难忘的是,通过此次重新瓜分中国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损失,列强攫取的利益也远远超过了前一次鸦片战争。其结果就是《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中国历代皇家园林的经典之作圆明园,也在遭到野蛮的掠夺之后,被付之一炬,昔日无比华丽精美的胜地,只留下空旷原野上的几处断壁颓垣。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特别是年近七旬的老将冯子材率领军队在镇南关外大败法军,取得大捷,正如黄遵宪在《冯将军歌》中描绘的:“闪闪龙旗天上翻,道咸以来无此捷。”然而在战场上的胜利并未能带来在谈判中的同样胜利,其结果又是以中国的失败妥协而告终,所不同的是,这是一次颇为奇特的战争:对方不胜而胜,我方不败而败。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经过了陆地与海上的多次交战之后,结果又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从前一直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小邦的东瀛之国,以并不比清朝海军先进的军事装备,竟然把李鸿章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北洋水师打得灰飞烟灭,片甲不留。这次中日战争的一个最大的结果就是近代史上又一个危害空前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又不得不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通常的情况下,败在强者的手下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接受一些,而败在自以为不该败的“弱者”手下,却无论如何显得更加残酷,不易被接受。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就是如此。也正是因为这次惨败,

第一章 中国近代戏剧发展的文化史背景

而且是败在一向被视为弱者的日本人手下,才真正惊醒了更多的国人,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反思自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进行的洋务自强运动及其带来的实际结果,对世界局势特别是中国在当时世界格局中所处的真正地位和可能出现的命运,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日本更不得不刮目相看了,于是便有了维新变法思潮的产生和发展。

维新变法政治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给中国的发展变革带来了又一次难得的机会。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下诏变法,一时之间,似乎给中国带来了摆脱屈辱命运、走上自强之路的最大可能。但是由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的百般阻挠,强烈反对,一场颇有声势的政治改革仅仅持续了103天,至9月21日(八月初六日)宫廷政变发生,随后就是大规模的清洗整肃,皇帝被软禁,新法被废除,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喋血北京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死里逃生,远走海外,开始了政治流亡生涯,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著即革职,永不叙用,黄遵宪也差一点身遭不测,经过多方努力,朝廷才从轻发落,落得个放归的下场,还有许多人被以各种方式处理,这就是一大批有识之士苦苦追求了许久的政治改革的结局。在血腥的镇压之后,又是守旧势力甚嚣尘上的复辟统治。本来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历史转机的政治变革,就像1868年的明治维新促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近代化道路一样,但是在中国这个顽固派势力极其强大、政治变革特别艰难的国度,戊戌变法留下的,只是无数人失望的眼神和无力的叹息。

内忧与外患始终是困扰近代中国的两大难题。戊戌变法和政变的政治风云尚未完全散尽,又一次危机以内外夹击的形式出现了,这就是1900年开始的义和团起义和由此引发的八国联

军进攻北京事件,以及随之而起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史称庚子之变。对于义和团起事,清朝统治者先是麻木不仁,之后又觉恐慌难安,态度暧昧,最后想出了一条自以为得意实际上极其愚蠢的利用义和团排外拒外的计策。这一举动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一方面中国华北地区直至全国都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动荡之中,清政府的统治更显出风雨飘摇之态;另一方面,各国再次联合起来,开始了更大规模的侵略活动,北京城也成了帝国主义国家逐鹿的场所。这一事件的结果就是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这一古老封建帝国完全殖民地化了,清朝统治者完全沦为供人驱使的走狗政府。在经历了如此惊心动魄的政治变故之后,1902年,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者终于感觉到应当采取一些变革的措施,自上而下地实行一些新政,但是此时采取的若干改革办法,已经不能真正振兴清王朝的统治,无法从根本上挽救这个政权走向衰微的命运了。

在维新派政治家们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另外一批思想更加先进、姿态更加激进的革命青年就开始逐渐显示出他们的政治力量,这就是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出现。1905年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民主革命的高潮已经在酝酿之中,也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正式登上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舞台。同盟会成立之后,在海内外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而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则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而且使封建皇帝统治百姓这一残酷的事实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虽然辛亥革命仍然免不了以失败告终,但是它的确使中国走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辛亥革命的成果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攫取,袁世凯称帝的

第一章 中国近代戏剧发展的文化史背景

野心昭然若揭以后,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1916年,这个准备上演复辟闹剧的政治骗子在忧惧交加中死去。随后而来的是北洋军阀的腐朽统治。这一时期,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鲁迅有诗句说“城头变幻大王旗”,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国家政治局势的一个写照。

就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状况之下,一大批有志新青年又在酝酿着一场更加深刻的文化革命,准备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以来中国屡遭败绩、国势日益式微的问题。遂有以李大钊、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为杰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1919年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分赃会议巴黎和会上,中国以战胜国家却又一次遭到西方列强的野蛮宰割,会议主张要把原来德国在山东的种种特权转让给日本,提出了危害中国主权和人民利益的二十一条,更加令国人感到惊诧的是,当时的北洋政府代表竟准备在协议书上签字。由于此前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由于广大青年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巴黎和会通过损害中国主权条款的事件为直接导火线,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主要代表的在京大中學生上街游行示威,声讨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反对北洋政府卖国求荣的行为。6月3日以后,由于上海工人阶级的参加,这次运动从北京扩展到上海等大城市,运动的主体也由青年学生变成了工人阶级。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无论怎样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无论怎样估计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和意义,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就是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在孤立的状态下发展的,它一直处于与外来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过程之中。众所周知,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把中国与西方联系在了一起,结出了丰硕的文化

果实；汉唐以来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宗教状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语的发展、中国文学的发展，还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假如把佛教的东来看作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入，看作是中外文化的第一次深入交流，那么，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包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文化的传入，就可以看作是中外文化的又一次大规模交流和全方位接触，其规模、深度、广度、影响都远远超过了前一次。

不仅如此，与第一次文化交流相比，这次文化变迁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更加刻骨铭心的还有三个方面的显著不同：一是文化输入的方式迥异。前一次文化交流基本上是以和平相处的方式进行的，而这一次主要是西方国家采取强制性手段、甚至是以武力方式进行的。二是中国文化在交流中的地位不同。在以往的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处于优越的地位，在文化交流中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文化优势，至少毫无自卑感；但这一次，中国文化却总是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伴随着种种屈辱和苦难，十分不情愿地进行这一文化“对话”的。三是今日的中国人对这两次大规模文化交流的感觉与认识，怀有大不相同的情感和心态。无论如何，前一次的文化交流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陈迹，虽然它依然留下许多文化成果和遗迹，但是今天的人们在回顾过去的历史时，已经能够做到比较平心静气，比较理性；而后者则不一样，近代以来正式开始的中外文化交流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这一过程目前仍在进行之中，而且有愈来愈深入的趋势。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今天的世界格局与 19 世纪中叶已经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今天的中国与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相比，更是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一变化，可能不是什么特别夸张的词汇。尽管如此，当今天的许多中国人在

第一章 中国近代戏剧发展的文化史背景

面对 19 世纪中叶以来直到当下的中国文化命运和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时候,仍然难以完全放弃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相当普遍的情感状态,难以控制从先辈那里遗传下来的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命运的复杂情感。这一切,都为我们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之近现代命运,提供了独有的优越条件,同时,也给这一学理层面上的考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也正是因为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之路的独特魅力和当代意义,许多学者根据自己对文化问题的不同理解,从不同角度考察与认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思想主题和现代化问题。蒋廷黻曾经这样概括近代中国面临的文化难题:“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① 此语虽出于 1938 年,但是今日听起来,仍然觉得切中中国近代命运之肯綮,不能不承认这是发人深省之论。

金耀基尝从社会学的角度思考中国的近代命运和现代化问题,指出:“中国现代化运动,本质上,是一文化的与社会的变迁。也可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会面’后中国文化的一种‘形变之链’的过程。”^② 他又根据汤恩比所创“文化的反射律”的说

① 《中国近代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 年,第 11 页。

② 金耀基著,《从传统到现代》,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8 年,第 161 页。

法,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归结为如下三个层次,对考察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文化变迁颇具启示意义:第一,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这是文化的最外层,是被西方文化冲破的第一道防线。文化中物质因素的转变较非物质因素为快,器物技能层面的文化转变是最容易、最迅速的,遇到的抵抗和阻力也最小。第二,制度层次的现代化。它更多地触及文化的内层,比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又深了一层,也难了一层,遇到的阻力更大些。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一层次的现代化比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是落后一步的。第三,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它是最难的,它牵涉到一个文化的信仰系统、价值系统、社会习俗等最深层的质素。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是最深刻的,因此也是最艰难的、最缓慢的,它遭到的社会文化抗拒也最强烈。^①

还有学者从世界文化格局之近代变迁的角度出发,将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关系理解为一种广义的文化冲突,指出:“简言之,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两出巨型戏剧——第一出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第二出是从第一出派生出来的,它揭示了中国在一场最巨大的革命中所发生的基本变化。”^② 这些著名的论述,对我们考察中国近代文化的历史变迁和境遇命运,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走近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遭遇和时下的处境这一学理问题和社会文化问题,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出

① 参见金耀基著,《从传统到现代》,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8年,第161~167页。

② 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页。